

中国证劵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深化科技运用 推动证劵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徐昭

1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在第三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证券行业要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深化科技运用是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青松认为，证券科技运用的基础是数据治理和数据生态。市场上低成本流动的海量数据，与机器学习、匹配算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和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在

资本市场上，金融资本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经济中的信息功能。但是随着海量数据时代的来临，货币的角色将可能被数据取代，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商业模式将出现颠覆式变化，一种新的数据驱动型金融科技机构，将向传统金融服务业提出挑战。

目前多数证券公司已意识到数据资产的价值和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在数据治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近期证券业协会的调查统计显示，已有超过50%的证券公司制定了公司层面的数据治理战略规划；80%的证券公司建立了数据治理组织架构，其中大部分证券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数据治理决策机构；70%的证券公司在数据治理不同领域制定相应章程、办法、规范；超过60%的证券公司基本实现数据集中；部分大型证券公司在数据标准、元数据、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70%左右的证券公司不同程度地对数据质量进行了管控；监管数据报送受到普遍重视；证券公司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普遍重视，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50%以上的证券公司数据治理工作涵盖或部分涵盖了子公司。但是相比银行业和国际一流投行，我国证券公司在数据治理方面尚存在不小差距，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数据科学特点的治理结构。

“数据生态是以行业数据资源为载体，通过数据共享形成协作共赢的有机整体，进而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安青松强调，国外数据生态发展已久，典型实践是行业内各成员之间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数据分享实现

数据价值的最大化，从而提升成员的营运能力和业绩水平。

通过金融数据共享，推动传统金融行业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生态体系，开展更深层次的协作和竞争，最终实现用户利益最大化，是金融数据生态的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证券行业发展已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数据的价值在于关联，只有通过全行业内外数据共享，才能满足证券科技创新带来的高附加值数据需求。因此，数据生态是证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下一步协会将借鉴国际和国内数据生态建设的经验，深入探讨明确行业数据生态的监管规范和指引，积极推动行业数据生态建设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技术标准的设计和推广，为证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基固本。

2018年GDP增长目标料平稳实现 专家预计基建投资力度将加大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2018年多项经济数据定于21日公布。多位专家预计，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或在6.6%左右，平稳实现年度增长目标。未来经济虽有下行压力，但存在多方面积极因素。同时，消费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展望2019年，经济增速虽然可能比2018年小幅放缓，但基本面仍是好的。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预计，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6%左右。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显著大幅回升，贸易顺差基本稳定，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计，2018

年四季度经济增长6.4%，全年增长6.6%，平稳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内外需求同步减弱，增长动能稳中趋缓，2019年经济增速将略有放缓。虽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基本面是好的，可能出现多方面积极因素。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2018年受国内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总体上呈现“三降两稳”特征，预计全年GDP增长6.6%左右，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三降”指：增长减速，下行压力增大；贸易顺差减少，国际收支方向逆转；经济效益趋势减弱，工业企业“两端”好于“中间”。“两稳”指就业稳、物价稳。

关注基建投资作用

展望2019年，宗良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将更趋复杂。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延续，全球经济或已进入本轮复苏的尾部阶段。中国

经济处在“大调整”关键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实体和金融、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等之间正在进行大分化、大调整和大融合。这个“大调整”过程可能将延续3-5年。宏观经济政策要高度关注外部冲击和“大调整”叠加形成同频共振，导致经济增长过快下滑。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GDP增速较2018年小幅放缓。

连平表示，2019年宏观政策着力点在于加大基建投资力度。预计2019年基建投资增长10%，成为拉动投资的关键力量。在过去几年限产作用下，高能耗制造业投资形成低基数，2018年出现修复式增长。2019年基数效应减弱，制造业盈利增速已趋回落，将难以支撑制造业投资继续较快增长。受外需环境影响，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预期较弱。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扩大生产投资显得非常谨慎，将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预计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到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调

控政策难以大幅放松，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房企资金来源压力仍然存在。随着土地购置款项支出减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有明显回落，预计增长3%-5%。综合判断，2019年基建投资力度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长可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约增长5.8%。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指出，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3%。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低位运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2019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从需求侧角度来看，2019年我国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消费形势相对乐观；出口贸易仍将增长，增速有所回落。

■ 今日视点 | Comment

稳增长需未雨绸缪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2018年经济数据定于1月21日公布，6.5%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料能实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2019年，中国经济要延续稳中有进态势，需未雨绸缪，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等情况来看，2018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9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6%以上。不过，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一些变化，经济复苏动力减弱，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不确定性增加。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需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关系。

稳增长要高度重视内需挖潜。从消费来看，尽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一定波动，但整体消费潜力仍然巨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约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新的增长点。从投资来看，基建“补短板”相关措施落地，且随着地方债规模扩大及发行提速，投资增速有望稳中略升。

稳增长更需强化政策协调，平衡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特别是促进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保持宏观调控力度，把握好调控节奏，为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的政策土壤。具体而言，货币政策要保持松紧适度，运用各项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尤其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财政政策要有的放矢，既要发挥好减税降费的红利效应，又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起到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功效。

另一方面，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财税、产业政策的优化协调，推进算法、芯片、传感器、智能软硬件等高端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推动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方面，重点解决供需错配，推进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建设。

此外，稳增长的重要落点在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依靠创新的力量，而创新的动力源于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2018年3月，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已突破1亿户。过去40年，这些微观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未来也将继续担纲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政府要“出手”，以精准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更要“放手”，健全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核心作用。

中国经济“柴火鱼大”。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经济仍然是成色好、底气足。随着改革深化、开放扩大，中国经济转型定能迎难而上，稳步前行。

期待ETF 业内人士料债市产品进一步丰富

□本报记者 彭扬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债券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境外机构加大投资境内人民币债券力度。对此，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需要不断加强境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丰富我国债券市场的产品体系，提升投资便利度。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高峰日前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论坛上表示，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注意两方面：一是在法律方面，若面临信用违约或破产，应该采用怎样的处理程序。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法律框架，这方面的混乱会延迟市场的发展；二是透明度和可预测度对于投资者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政策有连贯性。

上海清算所总经理周荣芳表示，在交易基础设施安排和互联互通的一些安排条件下，也要考虑增加更多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安排，使投资者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参与中国债券市场。

就如何加强境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周荣芳表示，对于托管制度的安排，现在有很多讨论。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托管的基本格局已形成，比较好的路径是在现有格局条件下来解决问题。从中国目前的体量看，允许多家基础设施机构参与托管业务，有利于提升整个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在周荣芳看来，在制度性安排上，要重点解决未来相关的法制化和市场化问题。要在一些违约和非正常退出的案例中找出规律性，寻求市场化解决办法，避免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希望未来能有相关的市场化程序和法律制度。

丰富债市产品体系

“要不断丰富我国债券市场的产品体系，提升投资便利度。”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副局长臧健表示，很多投资者初进中国债券市场，对整个市场体系包括语言、制度都会有所陌生。在此情况下，要发挥债券型指数基金如ETF基金的作用。下一步会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一步推进ETF基金发展，丰富产品，促进市场交易的便利性。

就债市的对外开放而言，周荣芳表示，近10年来，从总量、规模、参与数量来看，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债券通未来需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在投资者参与程度上，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相对发达国家的比例还有提高的空间；二是在债券通框架下积极扩大债券品种，尽可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三是未来若要服务于衍生品的发展，需要探讨和研究清算通道的安排。

从国开行的角度看，臧健表示，一是不断加强推进一二级市场建设，提升国开债的投资价值；二是要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开放，不断挖掘新的投资需求。中国债券市场在世界排名靠前，但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境外投资者持有比例也较低，下一步仍要积极推进。

数较低有关。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认为，化工属于传统行业，行业内优质上市公司2018年受益于去库存、上游集中度上升以及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实现业绩增长。此外，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电气设备四大行业属于制造业，大部分属于带有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因此，相关公司成长性较好，其增长也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展望2019年，赵亚贻表示，虽然全球经济预期不佳，但我国有望继续推出经济振兴措施。

（上接A01版）厚生智库研究员赵亚贻认为，以中小创代表的中小企业去年一度整体陷入困境，但经过大规模减税和纾困措施，这些企业熬过了寒冬，盈利状况开始恢复。

2018年10月以来，以纾困上市民企为主的相关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各路资金驰援，首批纾困专项债在交易所发行，沪深交易所相继推出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保险专项纾困产品推出。

业内人士认为，2019年经济料继续承压，全部A股公司的盈利可能延续趋势性回落，但

土地经营权入股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

为什么要开展这项试点？如何推行这项试点？怎样防范和降低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农业农村部负责人20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在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

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推进过程中应把握四个原则：一是落实“三权分置”，严守政策底线；二是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因地制宜推进，循序渐进发展；四是强化风险管控，维护农民利益。

农业农村部要以务实的态度、创新的思路、有力的措施，有序推进试点，确保取得实效。一是深入推进试点工作。对于已经开展试点的地区继续做好跟踪指导，督促尚未开展试点的地方适时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试点，进一步总结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做法和成效，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推广力度。

二是提升土地股份组织规范运作。推进相关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合法经营，加强财务管理，依法主动向入股的农户和社会公示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调查监测，依法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与各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为试点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疏通“毛细血管” 善用新金融业态

（上接A01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日前表示，这些措施具体包括调整宏观审慎评估（MPA）政策参数、扩大金融机构广义信贷增长空间、增设考察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和债转股工作的专项指标等。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分成两个环节，一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二是通过社会融资派生广义货币。现在实体经济社会融资不畅，流动性欠佳，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说明央行在投放基础货币上是到位的，但央行只是金融体系中的一环，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需要商业银行体系加以配合。当前去杠杆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住了商业银行的派生机制，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并未同时带来广义货币扩张。基础货币投放之后社融被阻塞，才是流动性传导不到实体经济中的主要原因。

“央行就像一个不停造血的心脏，但毛细血管被‘掐死’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应当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比如，财政方面，可以提前发放1.39万亿元专项债限额，或提前发放中央转移支付1万多亿元，给地方政府“补血”，以增强经济整体流动性。

从民营企业角度看，黄益平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融资出现困难很正常。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其实是因前期扩张过度、借贷过度才陷入困境，所以在“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范形成新风险。“出现问题后，毫无原则地救企业是不对的，不顾原则地救民企同样是错误的。”

此外，姚洋表示，资管新规要求表外业务回归表内，使得很多业务重新受到资本充足率影响。对于大银行而言，资本不够就削弱了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存款量较小，就拧紧了信贷“水龙头”。

着力加强监管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表示，影子银行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影子银行不是完全负面的词，只要依法合规经营，便能成为金融市场的有效部分。

吴晓求表示，银行的表外业务是金融发展基本趋势的体现之一。影子银行成本较高，但非国有企业可以获得资金，如果不能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存活就会比较困难。

“影子银行实际上满足了实体经济需求。”在黄益平看来，非正规金融部门实际上也支持了小微和民营企业。在加强监管全覆盖的同时要考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问题，不能为了处置和控制金融风险而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仍然是融资的重要管道。有时候我们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新金融业态没有‘数’，但一定程度上这些‘看不清楚的东西’才是金融的未来。”吴晓求说。

黄益平认为，在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要特别加强政策协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不要“四面出击”，很多政策需要协调，避免处置风险导致监管共振。当前金融委在监管力度和各项政策之间做了很好的协调，预计今年金融政策实施效果有所改善。

吴晓求认为，新的金融业态有不一样的风险来源，对监管提出新要求。比如，部分金融风险已经变异，虽然新的金融业态风险有点像感冒的状态一样，都是流鼻涕、咳嗽、发烧，但引起感冒的“病毒”发生了变化。传统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资本不足，因此监管要把资本放到核心位置。但对于新的金融业态，应该加强对资金使用透明度的监管。